

---

# 五十年的行「善」之路 ——鄧淑卿女士訪問紀錄

訪問：江淑怡\*、沈昱儀\*\*、曹慧如\*\*\*

記錄：江淑怡、沈昱儀、曹慧如

時間：2020年12月17日；2021年4月1日、6月18日、6月22日

地點：花蓮靜思堂（前兩次）、吉安鄉北昌五街鄧淑卿家（後兩次）

鄧淑卿，1944年出生於花蓮富里，後來舉家搬至玉里定居。她在1961年完成省立花蓮醫院的助理護士訓練，投入護理工作，並在1972年皈依證嚴上人，發揮專業與醫院的人脈，協助慈濟舉辦義診逾十四年的時間。1987年從助理護士轉為社會服務員，在上人的邀請下從省立花蓮醫院退休，改到花蓮慈濟醫院社會服務室任職，後於1989年升任社服室主任。社服室工作十年後，又因醫院發展需求，調到慈濟基金會總志業中心醫務發展專責小組擔任高級專員，一直到2007年從慈院退休，成為全職志工，持續發揮生命的良能，服務大眾。

---

\* 慈濟基金會文史處研修室人文學術組專員

\*\* 慈濟基金會文史處研修室文史出版組助理專員

\*\*\* 慈濟基金會文史處研修室文史出版組組員

## 一、務農持家的童年

1944年1月15日，我在花蓮的富里出生，用農曆來看是1943年年尾，所以生肖屬羊。不過，其實我爸爸的老家在大陸福州，他二十二歲（1935年）時自己從大陸來到臺灣，在花蓮光復<sup>1</sup>落腳，待了一兩年之後才搬到玉里（街）<sup>2</sup>。因為曾經學過怎麼抓藥，就跟著一位姓莊的中醫師，當起了中醫助理。

後來因為日本政府有禁止中醫<sup>3</sup>的關係，爸爸轉而向當地的

- 1 光復鄉在未設治前名叫「馬太鞍」，日本占據臺灣（1895-1945）後，設花蓮港廳，在現有的光復鄉境內，分別隸屬於鳳林郡的鳳林街及瑞穗街行治。臺灣光復後，國民政府遷臺，民國36年（1947）設治，為紀念臺灣光復，正式易名為光復鄉。資料來源：花蓮縣光復鄉公所，<https://reurl.cc/WEm7VO>，2021年4月21日檢索。
- 2 玉里郡為日治時期的花蓮港廳下的行政區劃之一，轄下有玉里街、富里庄、蕃地。戰後，玉里街改為玉里鎮，富里庄改為富里鄉，蕃地改為卓溪鄉。
- 3 臺灣在日治時期，醫師、醫生的執照、專業有別。醫生指日治之前即在臺灣從事病患診斷及投藥之人，大多為漢醫。據統計，1897年底，臺灣島醫生人數西醫24人，漢醫有1,046人，其中漢醫又分良醫（博通醫書、精研方脈者）、儒醫（習醫書之儒者）、世醫（繼承祖傳秘方秘訣者）、時醫（跟隨行醫世家學得些許治病方法者）。日治之後，建立醫師制度，要求從事醫師行業者須取得醫師執照。但是，當時臺灣既有醫生大都無意願申請醫師執照，而臺灣當地人也已習慣接受醫生診療，甚少願意接受日本內地人醫師治療。總督府有鑑於此，一方面，有意網羅這些醫生，發給執照，另一方面，也擬對之進行管理，遂於1901年7月23日發布「臺灣醫生免許規則」（府令第47號），其中規定醫生須取得地方首長所發執照，從事醫師行業。此項醫生執照之核發以該年12月31日為截止日期，僅此一次，其後未再核發執照，遂使臺灣島醫生人數逐年遞減。資料來源：〈臺灣日治時期醫師、醫生之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FB粉專（2018.10.10），<https://reurl.cc/O0YnO7>，2021年7月2日檢索。

福州同鄉領袖楊福官學裁縫，並在他的安排下到富里（庄）去做西裝，才在那裡認識了我媽媽。當時的布料不是隨便可以取得，是由日本政府配給，楊福官有關係可以拿到，爸爸才接受他的安排。

臺灣光復後，國民政府要接管玉里郡，有讀過書且文筆、書法都很好的爸爸，在楊福官推薦下擔任接管委員會<sup>4</sup>的工作人員，主要是做中、日翻譯的工作，爸爸也因此又搬回玉里，定居在和平路上。

後來玉里鎮（1946年）設立，爸爸就去考公務員，當時考試內容主要就是看你會不會寫國字，像是寫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還有國父遺囑等等，就這樣，他成了公務員；再之後他才調到卓溪鄉當民政課長<sup>5</sup>。為了讓生活好一點，爸爸跟卓溪鄉公所租地種相思樹和油桐樹，另外還在公所東邊的部落買山坡地種橘子跟鳳梨。

爸爸一直很熱衷於服務人群，所以很多同鄉都會到家裡來請他代寫書信、春聯；有婚喪喜慶的時候，則會請他去幫忙寫禮簿。比較特別的是住在我家斜對面的陳中和陳家，他們是做打石

- 4 臺灣省州廳接管委員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為處理本省各級地方行政工作，及繼續行使政權與籌設縣市政府，於1945年11月6日訓令臺北州、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臺東廳、花蓮港廳、澎湖廳，分設8個接管委員會，辦理各該州廳以下各級行政機構接管工作。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案支援教學網，<https://reurl.cc/4aLO4V>，2021年7月2日檢索。
- 5 受訪者鄧淑卿女士對父親在玉里當中醫助理到當卓溪鄉民政課長之前的經歷並無記憶，相關內容是由她的妹婿也是花崗國中前校長徐添枝先生於2021年7月2日透過電話口述補充。

子的石雕工作，會幫人家刻墓碑或為寺廟打龍柱、刻石獅，如果是遇到要刻字的部份，都是請我爸爸去幫忙寫字，寫好之後他們才開始刻。

家裡後來又生了五個孩子，最小的弟弟沒能長大就因為腦膜炎往生了。我是大姊，主要幫忙山上的工作，二妹就幫忙打理家裡。我讀玉里國民學校（今為玉里國小）、玉里初中（今為玉里國中）時，下課後都要騎著腳踏車到山上工作，除草、挖窟窿、播種、採收……什麼都要做，那草長得比樹還快，所以要經常去割。騎車路上我最怕經過玉里榮民醫院，那裡收容很多精神病人，經常有病人會裸體跨坐在圍牆上或爬在樹上，每次我都被嚇得要死。那時候要到卓溪鄉走的是溪埔地，不過卓溪不一定會有水，只要遇到乾旱<sup>6</sup>，我還要載水去澆果樹。

相思樹長大了可以做木炭，油桐樹我們是撿它掉下來的果實，這時全家會一起上山去撿，再用鐵製品把裡面的種子挖出來，那可以榨油來販賣。如果是採收水果，回家後，我就要用扁擔挑兩籃水果到中山路上的市場對面擺攤，賣不完還要擔著去繞街，看有哪戶人家要買。小時候都要做這些工作，真的是很辛苦，但為了家裡的生活還是要做，因為我的爸爸、媽媽更辛苦啊！

爸爸一方面要照顧家裡，一方面還掛念著留在大陸的阿公，當時臺灣和大陸是沒有往來的<sup>7</sup>，爸爸如果想要和福州的阿公聯

6 由於本地溪流，除大雨滂沱外，終年無水，所以舊名為「乾溪」，後來改為「卓溪」。資料來源：卓溪鄉公所，<https://reurl.cc/eEGdbm>，2021年4月21日檢索。

7 中華民國政府在民國38年（1949年）陸續撤退來臺，隨即發布戒嚴令控

繫，都要花錢透過特殊管道送信，每封信都是經過好幾道關卡才到家裡來；那些信都收在客廳桌子的抽屜裡，爸爸如果思念阿公，就會把信拿出來看一看。後來爸爸從一個福州同鄉那裡知道他有兄弟在香港當船員，可以幫忙把阿公從福州偷渡出來，再從香港轉到臺灣。爸爸抱著一絲希望請他幫忙處理，最後是花光了積蓄才把阿公接過來。



鄧淑卿（圖中）與爸爸鄧立峻、媽媽李秀蘭、二妹鄧翠卿在玉里老家合照。

管人民言行，而隨軍隊來臺兵官將領的親人尚有留在原鄉未能隨著軍隊一同來臺，在臺的官兵心繫故鄉親人的情緒也無能表達。在民國76年（1987年）時任總統蔣經國先生宣布解嚴令，同年11月2日更進一步開放兩岸探親，許多老兵及其妻子家屬紛紛帶著照片、飾品等信物前往原鄉尋找親人朋友。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reurl.cc/0j4ZA1>，2021年4月21日檢索。



1956年7月12日玉里國民學校兒童部第十一屆畢業照，鄧淑卿在第五排右邊數來第九位。



1959年7月1日玉里中學初中第十六屆畢業照，當時校長是朱炳南，在照片中西裝男子的左手邊；鄧淑卿在第四排右邊數來第十二位。

## 二、習護理得善因緣

1959年我初中畢業，因為沒有很認真讀書，沒能考上花蓮女中和花蓮師範<sup>8</sup>；那時讀完初中就能考師範<sup>9</sup>，讀書不用錢，畢業還能當老師。家裡雖然負擔很重，但爸爸告訴我們一定要讀書，所以一直為我留意繼續升學的機會，在知道省立花蓮醫院（今為衛福部花蓮醫院）招考助理護士<sup>10</sup>後，就鼓勵我去試試看，結果

- 8 全名為「臺灣省立花蓮師範學校」，於1947年創設，招收二年及四年制師範班，原先舊址位在花崗國中，1959年於今國立東華大學創新研究園區復建。1964年改製成為「臺灣省立花蓮師範專科學校」，直到1987年又改製為「臺灣省立花蓮師範學院」。而1991年改隸為國立，改名為「國立花蓮師範學院」，並在2005年以前不斷地增設各個學系與碩士班，同年正式改名為「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最終於2008年為因應少子化日益嚴重的問題，經由教育部的規劃，與國立東華大學合併，成為東華大學的美崙校區。於2011年改名為「國立東華大學創新研究園區」，在2017年成立農業永續研究中心，以產學合作的方式協助在地農業的發展。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reurl.cc/MA64pX>，2021年4月21日檢索。
- 9 根據教育部1932年公布的《師範學校法》和1935年訂頒的《師範學校規程》（民國36年再修訂）的規定，師範學校招收初中畢業生，修業年限三年，畢業後充任小學教師。師範學校在學制中僅相當於高級中學的程度。1963～1967年，政府因提高師資素質之議，陸續將各師範學校改製為師範專科學校，師範學校時代於焉終止。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https://reurl.cc/vqpa5y>，2021年4月21日檢索。
- 10 戰後臺灣護理人員短缺，政府於1948年7月17日允許各省立醫院設立「助理護士講習班」，入學資格，須在初級中學畢業，或具有相當程度年在十六歲至三十歲之女性，經入學試驗合格者。隨著受專業訓練的護理生與私立培育學校的增加，正式護理人員已足敷各院任用，於是在1964年4月18日予以廢止。資料來源：37午篠府純一字第4259號

我就順利考上了；那時的院長是林千種醫師<sup>11</sup>，他是留日的醫學博士。

那個年代，臺灣東部真的是非常非常落後，沒有正式的護理學校。我在省立花蓮醫院一年上課，一年實習。記憶裡，院內環境跟設計就像是臺大醫院的舊院區，都是很典型的日式建築，還有網球場等設施，很漂亮。

兩年後（1961年），我們那一期有三、四十個人畢業，醫院只錄取成績前五名的人留在院內或外派到玉里分院，我是被錄取的五人之一，而且很幸運地留下來工作。結果，1962年我就因為想家，申請回玉里分院服務，但是同年又申請到花蓮，因為玉里沒有那麼多病人，工作沒那麼多，我覺得學不到東西。

在護理工作上，我比較少在門診，大多是在內科、外科、小兒科、婦產科之間輪班，有時也要輪開刀房，像是在手術檯旁協助醫師拉勾，就是將動刀的傷口撐開固定好，還要擦血，讓醫師可以看清楚傷口。雖然我是叫作助理護士，名稱上來看不是正式的護士，因為不是受正規的護士訓練出身，但是在那個年代，很多人都是受這樣子短期的訓練，結業後就去從事護理工作<sup>12</sup>。

(37.07.17)、53府衛五字第13782號(53.04.18)，政府公報資源網，<https://gaz.ncl.edu.tw/index.jsp>，2021年4月21日檢索。

- 11 林千種醫師（1914-1998年）為花蓮近代的重要人物，曾任花蓮醫院戰後第一任院長、花蓮救國團首任主委，戰後亦發起重建花蓮高爾夫球場，現今球場內依然留有紀念他的「千種碑」。資料來源：花蓮在地文化記憶庫，<https://reurl.cc/qgmn7g>，2021年4月21日檢索。
- 12 光復初期，對護理人員的訓練要求較不如今日嚴格，國小畢業後成績優異者，可由學校推薦至金瓜石醫院擔任助理護士，助理護士一邊工作、一邊學習護理知識，學習能力強者，甚至在受訓數個月後就能勝任打針、外傷縫合處理等工作。資料來源：鄭春山，〈金瓜石醫院護理師與早

工作以外，我很愛跳舞，常常和同事、朋友到忠烈祠後面的空軍雷達站（美崙山雷達站）、防空學校<sup>13</sup>或花蓮港的海巡處，他們有很大的球場可以跳舞。因為這樣，我在雷達站認識了從臺中來當兵的陳文通，他退伍後留在花蓮擔任花蓮客運的稽查員，有了穩定的工作，我們才在我二十四歲（1968年）時結婚。婚後公公、婆婆也從臺中搬到花蓮定居，跟我們一起生活。

隔（1969年）生下老大陳彥佐，再一年生老二陳彥樺，老三陳潔瑩是1979年才生，跟老大足足差了十歲。後來，我先生被老闆轉到關係企業豐濱汽車遊覽公司工作，豐濱除了遊覽車事業，還有一家旅行社，都是讓我先生承擔總經理；北迴鐵路通車<sup>14</sup>後，他們的業務越做越大，在臺北濟南路上有一個據點，有一百多輛車跟司機，還有一棟房子當宿舍，所以我先生為了工作，平日幾乎都在臺北。

1960年代，院內同事林怡君是慈濟委員，委員號五十，法號靜懿，她邀我和另一位同事林碧芑當會員，每個月捐錢救人；林碧芑大我十歲，原來住臺中，在日治時代學護理，也是很熱

期護士的養成〉，典藏新北學，<https://reurl.cc/xgVN25>，2021年4月21日檢索。

- 13 空軍防空學校，設立於1934年（中國大陸），在對日之抗戰期間成為培育防空幹部之重要場所，且同時肩負全國防空作戰的指揮場所與建立防空情報系統之任務地點。1948年移至臺灣，新址設於花蓮吉安南埔，後因應時代需求，於民國1984年裁撤。資料來源：花蓮在地文化記憶庫（2021年8月13日更新），<https://reurl.cc/zepqVk>，2021年10月31日檢索。
- 14 1980年2月1日，北迴鐵路通車，由省府主席林洋港主持通車典禮。次日起開始客貨運營運。資料來源：臺鐵大事紀，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https://reurl.cc/WEK0VL>，2021年4月21日檢索。

心服務，因為先生調到花蓮菸葉廠<sup>15</sup>工作，所以她就跟著搬來花蓮，到省立醫院上班。

1972年，有一天靜懿又問我們要不要去農場<sup>16</sup>皈依<sup>17</sup>慈濟師父。其實我對民間信仰沒有概念，也不認識佛教，更不用說皈依，是後來跟著（證嚴）上人做慈濟，才慢慢地了解佛法、佛教。那時候只記得從小在玉里，爸爸、媽媽就是拿香拜拜，還有媽媽常常去寺院，她雖然不認識字，可是心地很善良，可能就這樣的因緣，我傳承了媽媽的善心。

我跟碧芑聽到靜懿的邀約，都覺得應該去看看我們每個月捐款護持做善事的師父，就答應她。於是，三個人一起從花蓮騎腳踏車到農場（靜思）精舍去皈依，所以靜懿是我的母雞<sup>18</sup>，她帶我

- 15 位於吉安鄉仁里村中山路一段的臺灣菸酒公賣局花蓮菸葉廠舊址，日治之初，在花蓮港廳的吉野、豐田、林田等地都種植黃色的菸草，而菸葉廠即為收購與加工之處，設有倉庫、工作場、辦公廳舍和公務房舍等。民國42年（1953），菸草工廠業務撤銷，改稱為「花蓮菸廠」。民國89年（2000），為因應加入WTO之後開放洋菸酒進口及民營化的趨勢，花蓮菸廠與屏東菸廠合併，廠務及生產作業也移往屏東，為花蓮的菸業歷史劃下句點，花蓮菸葉廠也自此走入歷史，閒置迄今。資料來源：吉安鄉農會資訊服務網，<https://reurl.cc/MZKDqn>，2021年4月25日檢索。
- 16 康樂村舊稱。康樂村是臺灣戰後才從北埔村分立出來，在日治時期屬北埔村的北半段，因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曾在此設「北埔農場」，因而又被稱為「農場」。資料來源：李宜憲等撰述，〈第五章 新城鄉〉，《臺灣地名辭書卷二花蓮縣》（南投市：臺灣文獻館，2005年），頁148、149。
- 17 皈依指身心歸向而依投於佛、法、僧三寶，亦作「歸依」；所謂皈依佛寶以為師，皈依法寶以為藥，皈依僧寶以為友，故亦稱「三皈依」。皈依在梵語中含有救濟、救護之義，即藉依三寶之功德威力，以加持、攝導皈依者。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https://reurl.cc/ogVm7Q>，2021年4月25日檢索。
- 18 慈濟人常說的「資深」、「資淺」，是從「母雞帶小雞」的意旨演變而來，



1974年8月26日省立花蓮醫院新舊院長交接典禮攝影。前排右邊數來第八位是省花第一任院長林千種醫師、第十位是新任院長王英俊醫師、第十一位是前任院長郭功震醫師，鄧淑卿是第二排右邊數來第七位。



小女兒陳潔瑩四個月左右時在照相館拍的全家福。由右至左為先生陳文通、長子陳彥佐、鄧淑卿、次子陳彥樺。

們去皈依，我才有後續的因緣。那天的因緣很好，在大殿前就遇到上人，我和碧芑兩個人在大殿就禮佛、皈依了；上人知道我們都是護理背景，就給我們法號是「靜善」、「靜良」，意思是要我們用「善良」的心來照顧病人。

### 三、促成義診嘉惠貧病

上人跟我們談話時，說起了他在做慈善工作的觀察，照顧戶的病苦，讓他體會到需要有義診來解決，所以他想要在花蓮辦醫療、做義診。

聽到上人這樣說，我想起了自己在醫院工作時的觀察。當年臺灣還沒有全民健保，只有公保、勞保，以及擁有貧戶身分的人，除了這三種，其他的人看病都要負擔一筆龐大的費用<sup>19</sup>。我

其深層意涵就是「人帶人」的藝術。母雞為哺育小雞，不斷地以爪耙蟲；若遇下雨轟雷，更不忘展翅擁子入羽懷，呵護備至。在慈濟世界中，每個人都有母雞，每一個人也曾是小雞。資料來源：賴怡伶，〈樣式演變，莊嚴和團隊精神最重要〉，《慈濟月刊》474期（2006年5月），頁40。

19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開辦前，1950年開辦的勞工保險、1958年公務人員保險、1989年農民健康保險，1990年低收入戶健康保險等，都是提供就業人口醫療保障；還有約850多萬人口，主要為婦女、孩童及老人，最需要醫療照護的族群沒有醫療保險。1995年全民健保的實施，最直接成就是使全國民眾均能享有平等就醫權利，而且民眾可至任一醫療院所就醫，不像以往因職業身分而有區隔，例如榮民須至榮民醫院，才享有優惠，軍眷限於軍方醫院就診，公保被保險人須經公保聯合門診中心轉診，方可至特約醫療院所就醫。民眾從此免於因病致貧或因貧而病的恐懼，不再因財務障礙導致無法或延誤就醫。資料來源：蔡淑鈴總編輯，〈結穗跨步全民健康保險十八紀實〉（臺北市：健保署，2013），頁21、

那時候每個月薪水大約兩三百元，到省立花蓮醫院住院的病人要先繳保證金三百元左右。除此之外還有「店保」，就是要找做生意的人做保證人，如果病人沒錢繳，醫院就找店保負責。

我當下覺得做義診是很有意義，也應該是很簡單的事情，因為我們省立醫院就有很多醫師。我跟上人說：「我來跟醫師們說說看！」我心裡想，義診時，內、兒科有張澄溫醫師就很夠了，外科就找黃博施醫師，再找個藥劑師，我來準備護理工作，做好前置準備的事情，醫師聯絡安排好……

在醫院裡面，我是一個手腳俐落、做事很快，也不會挑工作的人，做什麼都很積極，所以和同事們的互動都很好。結果我和碧芑回到醫院邀約的時候，大家真的都同意了；那時候張醫師、黃醫師都很年輕，我才二十八歲，兩位醫師大概三十出頭。

就這樣，1972年9月10日義診所正式啓業<sup>20</sup>，剛開始安排是每星期日舉辦義診，因為求診的病患很多，而且有些病患沒辦法等一個星期後再來就醫，就再增加星期三<sup>21</sup>，後來又為了配合

63、81、177。

20 本會自本月十日起延聘省立花蓮醫院內外科名醫，為貧病者醫療，並供應藥品。本會附設貧民施醫所暫設在花蓮市仁愛街廿八號佛居士同修會內，施醫時間為每星期日上午九時至十一時，必要時得酌延時間。資料來源：〈本會辦理貧民施醫每星期日上午就診施醫所設仁愛街廿八號醫師義務診斷免費給藥〉，《慈濟月刊》71期（1972年9月），頁5。

21 本會於9月10日起辦理貧民施醫義診，每星期日及星期三在花蓮市仁愛街廿八號佛教居士同修會內為貧病者服務，三個星期來，受益貧病者共計九十人次。本會創立許多年來，依本會委員查訪貧戶的資料中所了解，其貧困的原因，大都是因身體有疾病致失去工作維生的力量，因此，本會感到非附設貧民義診不可能達到妥善的救濟——根除他（她）們貧困的根源！現在有殊勝的因緣：得花蓮省立醫院內科醫師張澄溫先

醫護人員的作息，改成星期二、六<sup>22</sup>。

義診都是利用省立醫院的午休時間進行，一結束大家就趕回醫院上班。我都會事先安排好到義診所輪值的醫師，義診當天再聯繫一次，如果有哪一位醫師臨時有事沒辦法離開，我就趕快找其他人幫忙。有一次，張澄溫醫師有急診的病危患者，他沒有辦法走開。這種臨時找不到醫師的時候，我就找張澄溫醫師的爸爸張有傳醫師，他自己開診所，時間比較機動。義診就是這樣一次次圓滿。

來義診所就醫的人，除了我們的照顧戶，還有沒錢看病的民衆，退除役的榮民也很多。早年從大陸到臺灣的國軍退除役爲榮

民後，政府有提供土地給他們開發<sup>23</sup>，在光華村<sup>24</sup>就有很多這樣的榮民。在我記憶裡，很多老榮民不是娶原住民，就是和智商低一點的女孩子結婚，因爲那些女孩子的父母會覺得只要能把女兒嫁出去就好。這樣的家庭常常會有太太跑掉，留下年歲大的先生<sup>25</sup>，想來實在是很不捨，也很無奈。

23 爲了讓追隨政府來臺的單身官兵走入社會，繼續爲國奉獻，政府利用國有農地、山坡地、河床地、林班地、水池地，政策輔導 6,500 名退役榮民從事農林漁業，安置於在各縣市成立的「大同合作農場」，投入農墾工作。退輔會於 1957 年開始在宜蘭大同農場進行首次授田，其後包括花蓮壽豐、臺東池上、屏東隘寮、嘉義、彰化、臺東鹿野、屏東竹田、高雄、桃園、苗栗等農場皆陸續供榮民開墾，讓他們落地生根，成家立業。1998 年各縣市地區「大同合作農場」陸續裁併成 8 大農場，並進一步因應社會發展與變遷，進行土地活化，透過土地委託經營方式，引入民間活力進行有機農業生產、農業經營及觀光發展。資料來源：〈放下槍桿拿起鋤頭榮民開墾阡陌良田奠基今日有機農業觀光農場〉，中央社「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網站，<https://reurl.cc/YWzOXn>，2021 年 4 月 29 日檢索。

24 花蓮農場成立於民國 41 年（1952）11 月 1 日，原名「花蓮大同合作農場」，51 年 7 月 1 日歸退輔會自行管理，經多次裁撤併於 58 年 11 月 1 日改稱爲花蓮農場，下轄光華、西寶及泰來分場。52 年 5 月成立光華分場，其後弟兄們安家落戶，演變成爲今日的光華新村，充分顯現早年榮民弟兄「與河川爭地、向石頭要糧」之艱辛開墾。資料來源：〈東部開發大隊石頭夢——緬懷榮民前輩與河海爭地也墾史實〉，花蓮縣榮民服務處（2017 年 5 月 17 日），<https://reurl.cc/L0G7X3>，2021 年 4 月 29 日檢索。

25 黃○○，男，六十四歲，住花蓮縣吉安鄉光華村。政府對於爲國效勞的軍人們於退伍時均安排有耕地和住屋，讓退伍軍人安居樂業，無奈歲月無情，退伍軍人漸漸老邁，其子女尚小，若其妻不耐貧困或無工作能力時，便會造成許許多多的社會問題。黃君由政府劃分了九分地供其耕作，不幸脖子生瘤，現住在鳳林榮民醫院，需要開刀，其年輕的太太卻不耐貧寒，不肯吃苦，三年前棄子離家，家中有子女五人均在學中。其醫療費由政府負擔，然家中五個孩子之生活卻全無著落，誰來負擔？現

生，及外科醫師黃博施先生心懷慈悲濟世的醫德，爲貧民義務診療。又該院護士林碧芭、吳素蓮、鄧淑卿，以及林怡君小姐，義務作護理及配藥等工作。還有本市南京街張藥房，張溪池先生幫助會長籌備施設一切所需，並捐出適應各疾病的藥材，更難得的是他每次都來參加護理及配藥的工作。本會能如願地設立貧民義診施醫實是全仗以上各位慈悲熱情的醫護人士鼎力促成，會長釋證嚴及本會同仁均十二萬分感激。資料來源：〈貧民施醫應診者眾 各界讚揚本會善舉 施醫日期爲每週日、週三〉，《慈濟月刊》72 期（1972 年 10 月），頁 5。

22 本會舉辦的義診施藥，自 11 月 13 日起更改時間，以配合護理人員的作息時間。過去每逢星期日及星期三，現改爲每星期二及星期六，時間爲中午十二時半起至二時止。資料來源：〈會務報導〉，《慈濟月刊》86 期（1973 年 12 月），頁 15。



求診的榮民中，有一部分是來自榮民之家，我問他們，榮民之家不是都有醫師看診嗎？才知道那裡的醫師一星期只去一次。另外就是仁愛之家的老人家（現為衛福部東區老人之家），那裡雖然也有醫師駐診，但同樣不是每天都有。這些地方的老人家如果在非醫師到診日有需要，剛好又遇上我們的義診時間，就會來找我們。還有些病患是從比較遠的地方趕來，像是壽豐的鄉親，他們住得遠，怕輪不到醫師看診，都是一大早就跑來排隊。

每次舉辦義診的時候，上人只要人在花蓮，再怎麼忙都會排除困難過來<sup>26</sup>，一方面是關心照顧戶，另一方面是要對醫護們這

黃家一切家務全落在其長女身上，全家的生活僅靠一年所收的十包稻子來維持，生活之清苦可想而知，本會委員親自去調查，其境況的確可憐！為照料黃家五個子女的營養，本會決議每月補助現金二千元、白米四十六臺斤。資料來源：〈上月長期救濟增廿二戶〉，《慈濟月刊》157期（1979年11月），頁25。

- 26 例如首次義診的三天前，法師在義診所勘察隔間工程施作時，突然接到豐原俗家打來的緊急電話。「媽媽這幾天胃痛得很厲害，常常暈過去，剛剛又休克了！」在臺中讀大學的妹妹焦急述說，醫師說是胃穿孔，必須立刻手術，「但媽媽說你要在身邊，她才肯開刀……」義診所明天即將啓業，法師經過一番心理掙扎，請妹妹轉告母親：「既然出家了，普天下都是我的父母、兄弟姊妹。義診所是為照顧所有人的父母與兄弟姊妹，請媽媽成全我——好好配合醫師治療，讓我先安心辦好第一次義診，再趕回去。」從花蓮到臺北，再轉車到臺中，加起來要十多個鐘頭。為了及時趕赴母親手術，有心臟病的法師第一次冒險搭乘飛機。小飛機搖搖晃晃飛抵臺中機場，趕到順天醫院時已經黃昏了。醫師一看到他就說：「你媽媽堅持要等到你才願意開刀，不能再拖了，明天一早馬上動手術！」手術從一早開到下午，終於開刀房的門打開了，醫師端著一個鐵盤走出來，上面放著剛切除下來三分之二的胃。在花蓮的義診所醫護志工，得知法師的媽媽平安完成手術，都鬆了一口氣。親見法師以義診為重，他們也承諾：「日後無論再怎麼忙，都不會輕易放下義診！」資料來源：涂心怡等撰述，《慈濟的故事：「信願行」的實踐 貳·善護》（臺

分付出的精神，表達感恩。我知道，上人雖然表面只說來看看，但他內心的感恩其實很深，因為這些醫護願意跟我們這樣無償服務病人，真的是不容易。我也清楚上人很珍惜情感，所以一直到現在，我都是每年代替上人去關懷這幾位醫師，感恩他們過去無怨無悔的付出；他們也有來看過上人，雖然不是時常來往，但彼此的情誼都還在。

1986年8月17日，我們慈濟醫院正式啓業，當時仁愛街的義診還是持續在進行，我心裡十分掙扎，還要繼續請省立醫院的醫師每個禮拜來看診嗎？他們要是跟我說：「你們自己醫院就有醫師了，何必再叫我？」那我要怎麼回答……但是，醫院剛剛開業，多少有一些不順暢的地方，所以這幾位醫師什麼都沒有說，還是繼續支援，一直到12月義診所結束，十四年多的付出才告一段落。

在這段歲月裡，很感恩老先生張有傳醫師與張澄溫醫師父子檔，黃博施醫師、朱隆陽醫師、鄒永宏醫師、李武憲醫師等，因為有他們的愛心與付出，把救人當作是本分事，才能在醫療資源缺乏的年代，嘉惠超過十四萬人次的貧病患者。

現在想起來，我自己是感到很殊勝，有那麼好的因緣，能見證慈濟從義診所開始，到人醫會<sup>27</sup>誕生，再延伸到全球。這些都

北市：慈濟人文，2019），頁303～306。

- 27 全名為「國際慈濟人醫會（TIMA）」，由醫師、護理、醫技、藥劑及慈濟志工所組成的醫療服務團隊。前身為1972年成立的「慈濟貧民施醫義診所」，每週固定兩次義診，並且不定期舉辦下鄉巡迴義診；1986年花蓮慈濟醫院啓業，義診所任務由醫院接棒，定期巡迴於偏遠、醫療不足地區。而後越來越多不同醫療院所的醫護人員，在證嚴上人號召下加入義診，並於1996年成立「慈濟醫事人員聯誼會」，1998年正式成立國際慈

是從上人不捨貧病弱勢的一念心開始，再進一步啓發專業醫療人員、技術人員一起做。那分無私的精神代代傳承，就像已經往生的菲律賓呂秀泉副院長（1934-2012）<sup>28</sup>，雖然人已經不在了，但他的精神在全球的人醫會成員身上延續下來。



1970年代義診所成立初期，鄧淑卿（右一）與省立花蓮醫院醫護人員參加靜思精舍冬令發放後，與證嚴上人合影。

濟人醫會。資料來源：〈國際慈濟人醫會〉，慈濟全球資訊網（2009年2月16日），<https://reurl.cc/2bdzRa>，2021年4月29日檢索。

- 28 呂秀泉醫師，頭頸部外科專家。1934年出生於菲律賓，是第三代華僑。1966年取得美國賓州專科大學博士學位，並於該校擔任副教授，之後回到菲律賓擔任崇仁醫院副院長，也曾任「菲律賓專家醫學會」首席主席與主考官。1995年，他號召群醫與慈濟合作展開義診。1996年9月27日，呂秀泉帶著醫療團隊成員回到靜思精舍過中秋，第一次見到上人；那年上人親自為他們命名「菲律賓慈濟醫療團」，並從此訂下中秋相聚的約定。1998年，國際慈濟人醫會正式成立，菲律賓慈濟醫療團隨即更名「菲律賓慈濟人醫會」，並自2000年起擇在中秋佳節期間舉辦年會，全球成員依循呂醫師與上人的約定，回到花蓮團聚慶賀。2012年8月17日，呂醫師因病離開人世，他帶領菲律賓慈濟人醫會的十七年裡，共舉辦一百五十二次大型義診，嘉惠近三十萬人。資料來源：何日生總編輯，《2012慈濟年鑑》（花蓮縣：佛教慈濟基金會，2013），頁128。



慈濟貧民施醫義診所服務鄉親畫面。鄧淑卿（左一）。



慈濟除了在貧民施醫義診所舉辦定點義診，也會邀集醫護團隊做下鄉義診服務。圖為鄧淑卿參與1985年2月15日，臺東縣臺東市國民黨臺東縣黨部中正堂（介壽堂）的慈濟冬令發放暨義診活動。

#### 四、會員轉委員 護理轉社服

1972年皈依後，除了義診之外，還有一件事情讓我印象深刻，也感到很不捨。上人身體本來就不好，過去是靜慈師姊<sup>29</sup>固定帶上人到花蓮市的張新藥房打針，我皈依後就由我到精舍去幫上人打針。有時候在上人的寮房為他打點滴，他躺著，我就坐在旁邊，大概一次都要四十多分鐘，慢慢、慢慢打，打完後就趕回醫院上班。

那時候的生活很規律，每天就是上班，需要時進精舍幫上人打針，還有忙義診的事情。所以即使有了上人給的法號，我也只有捐款當會員，沒有拿勸募本去募會員。但是在義診所的工作中，常常聽到師姊們說訪視、討論照顧戶的事，或是談起要去哪裡救災，我都是默默地聽，放在心裡。

一直到了1978年，我主動跟上人講：「我也要做委員。」上人就跟我說：「要做委員不趕快去拿簿子，去領簿子趕快去募款。」就這樣子，我成了慈濟委員，委員號九十四；幾年前跟我一起皈依、做義診的碧芑也是比較慢才當委員，她的委員號是二百零九。但我不清楚早期委員是如何編號，那數字不完全代表做慈濟的先後，演變已經太多了，可能跟上人對我們這個民間團體、委員組織要怎麼發展，或是那時候的社會型態，還有委員互相接引的關係有關。

我開始當委員的時候，大概就是分成兩部分，比較早期較年長的那一群，包括日存五毛錢、拿竹筒去菜市場募款的家庭主

29 靜慈為慈濟委員號四號吳玉鳳的法號。

婦，或者是出入精舍比較頻繁的師姊們；再來就是像我這樣，後來才加入的師姊。上人要申請成立基金會時<sup>30</sup>，有再進行一次委員編號，所以像林碧玉<sup>31</sup>、林素雲<sup>32</sup>、林慧美<sup>33</sup>、靜淇<sup>34</sup>，我們幾個剛好年紀差不多，也都是那時候一起當委員。跟早期較年長那一群師姊比起來，我們幾個算是比較年輕的。不過，我想把委員的工作做好更重要。

1979年的教師節，我女兒陳潔瑩出生，那時候要兼顧家庭和慈濟事，如果工作還要輪大、小夜班，真的是比較辛苦。為了轉換跑道，我努力做準備，通過了衛生行政人員的升等考試。接著就到院內的人事部門詢問有沒有什麼出缺，得知有一個營養師，還有一個社會服務員的工作。那時候社會服務員是擴編的新職缺，我積極去向院長爭取，我告訴他，我有很熱衷服務人群的心，專業部分也願意努力去學，才讓我爭取到這個工作。

因為工作的需要，我時常代表醫院出席各種大大小小的社服工作研討會，像是1981年4月12日在東海大學舉辦的「全國醫務社工員研習會」，這場研習會可以說是臺灣醫務社工的開始<sup>35</sup>，

30 1980年1月16日，為籌建醫院，依法申請設立「財團法人臺灣省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省府通過頒給立案證書，許可文號：六九社五字第二三三五號，成為臺灣第一個冠上「佛教」的財團法人。資料來源：慈濟年表資料庫。

31 林碧玉1978年受證，委員號92，法號靜憫。

32 林素雲1980年受證，委員號110，法號靜愜。

33 林慧美1976年受證，委員號90，法號靜盈。

34 靜淇為117號委員李惠瑩的法號。

35 1981年4月東海大學召開了「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人員研習會」八十餘位來自國內各縣(市)之醫務社工人員積極參與。在該次會議中，除針對醫院社會工作部門設立的標準，社工人員在醫院中的角色等主題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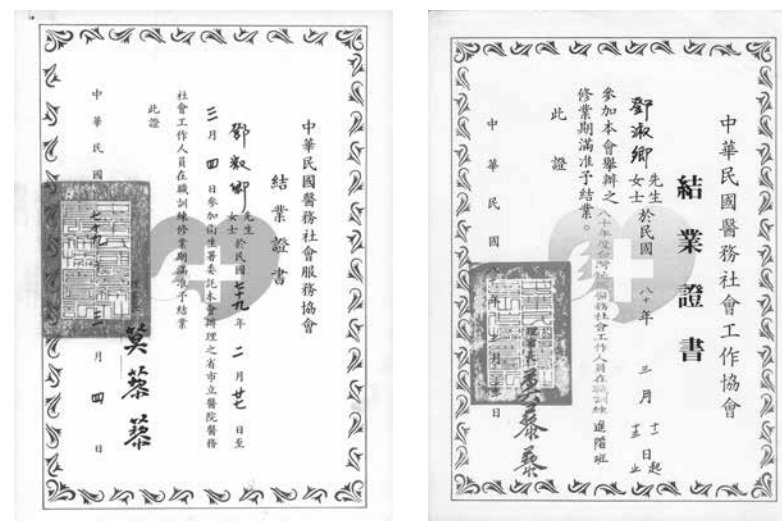
那時候北部的臺大、國泰、馬偕、北榮總、長庚等大醫院都有代表去參加。

不管護理或社會服務工作，對我來說本質都是在助人，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護士是直接面對病患的疾病，對症照護；社會服務室要同理病患的心理，層面會牽涉到他的生活、家庭、經濟等問題。例如中風或脊髓損傷的患者，要幫助他們認識病症和可能帶來的影響，引導他們去正向面對自己的現況，甚至包含家屬的陪伴、心理建設，這些都是在社服工作上，很重要的事情。



鄧淑卿（第三排正中央）代表省立花蓮醫院到東海大學參加全國醫務社工員研習。

研討外，與會人士更積極呼籲應成立「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以積極推展醫院社會工作。會中並推選籌備小組成員，以推動成立協會……1983年7月9日，獲內政部同意籌組，並定名為「中華民國醫務社會服務協會」。1991年協會更名為「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協會的成立，一方面帶動了國內醫務社工界素質的提升，另一方面配合為臺灣地區社會福利政策的推行，勾劃出一套具體可行的藍圖與發展的方向。資料來源：李雲裳，〈臺灣地區醫務社會工作之發展〉，《社區發展季刊》109期（2005年3月），頁167-168。



鄧淑卿參加省立醫院醫務社會工作人員在職訓練結業證書。（左圖）1990年時協會名稱為「中華民國醫務社會服務協會」，（右圖）1991年已改為「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

## 五、職業志業合一 投入脊損病友關懷

我因為參與了許多研習會，對社服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但在實際服務弱勢患者的時候，卻面臨了很大的無力感。那時候省立醫院的資源不是這麼足夠，我還被賦予了很多行政工作，再加上它是政府機構，預算就這麼多，所以面對窮困病人的需求，多半是幫他轉介，尋找其他政府或社會慈善團體的資源來援助，沒辦法立即、直接地為他們解決困難。

如同我們在仁愛街做義診的時候，只能醫治一些較輕微，或者是慢性疾病，碰到較嚴重或者緊急的狀況，只能立刻送病患到

大醫院就醫，同時為他們辦理住院。何況東部的醫療資源缺乏，遇到重大疾病沒有絲毫的保障可言，要是我們能夠擁有自己的醫院，非但能培養良醫，病人們也可以得到較為妥善的照顧。因此，上人才會著手計畫蓋醫院。

我在省立花蓮醫院擔任社會服務員，一直做到 1987 年，才在上人的邀請下離開；8 月 31 日退休，9 月 1 日我就開始到慈院的社會服務室上班了。

其實，早在 1986 年慈濟醫院啓業前的裝修階段，融師父<sup>36</sup>就對我說：「妳自己要去監工喔！社會服務室妳自己要去顧。」隔年換上人問我：「自己的醫院開始了，妳不回來？」我才回來。我最初想的是，先把機會讓給年輕的社工，所以一方面去邀請有經驗的社服工作人員來帶領慈院的社服工作，另一方面是幫忙招募新人。

好不容易從臺北邀請到蘇信如小姐願意到花蓮來服務，她是臺大社會學碩士，也有豐富的社會服務經驗。她在 1987 年 7 月到職，擔任社服主任，但只帶領我們半年左右，就因為懷孕害喜嚴重，沒辦法臺北、花蓮兩地舟車勞頓而離開。後來才由我代理主任一職，並在 1989 年 8 月正式受聘為主任。

早在慈濟醫院成立後，就有許多其他醫院轉介來的個案，個個棘手、困難重重，有些是被子女拋棄，有些是中風或癱瘓，家屬認為進入「慈濟」醫院就有人照顧，所以一丟下就不聞不問，甚至還有從北部、西部的醫院，轉院而來的，有些病患早已昏迷多時……

36 釋德融法師，為證嚴上人的三弟子。

只要是無法解決的醫療個案，或者是無人問津的病患，又或者是付不出醫療費用的病患，幾乎都會被送往花蓮慈濟醫院。送病人的人什麼也沒交代，把病人一丟就跑了，彷彿擔心我們會拒收一樣，那時候我們慈院成了名副其實的「後送醫院」。

在慈院做社服雖然比較能為需要的人提供實質的幫助，但承擔主任的角色，也讓我感受到很大的壓力。身旁的年輕同仁都是受專業訓練的社工，而我是半路出家，只有社會經驗比較資深，再加上我同時也是志工，所以很多時候會覺得他們無法達到我的要求。比方說，我期待社工能在自己負責的科別中去推動病友團體，但他們會覺得手上的工作已經忙不過來了。遇到這種挫折的時候，我就會跑到病房去關懷病人，轉移我的心情。

社服做了十年後，我因為醫院發展的需求，被調到本會（慈濟基金會）的醫務發展專責小組擔任高級專員，負責公傳媒體的工作，就這樣一直到 2007 年退休。退休後，我心中還是惦記著院內的病友團體，尤其是我負責輔導、陪伴的脊髓損傷聯誼會。聯誼會的成員大多是青年及近中年的病友，他們因為工作或意外事故造成脊髓損傷，很多是下半身或四肢全身癱瘓的狀況。當時我特別關心與花時間在這個團體上，1987 年聯誼會成立，是慈院第一個病友團體。

我印象都很深的是一個吉安鄉太昌村的個案家庭，爸爸經常酗酒，媽媽是水泥工，家中七八歲的小女孩因為曾經被打，造成腰椎骨折，治療到後來確定是下半身癱瘓，就被帶回家。我們去家訪的時候，只有小女孩和弟弟在家，小女孩裹著一件棉被，大小便都在身上。

所以我覺得脊髓損傷真的是非常辛苦，家庭要負起很大的照

顧責任，可是沒有家庭支援的時候，我們就要從旁協助，否則長輩也可能往生，剩下患者要怎麼生活？我們一直照顧她、鼓勵她，直到她可以坐輪椅的程度，就安排她到屏東的專門教養機構，學習自我照顧的能力。她現在應該已經三四十歲了，之前在醫院遇到我，都還會叫我一聲：「鄧阿姨。」



1989年8月，鄧淑卿獲聘為花蓮慈濟醫院社會服務室主任。

## 六、慈善初衷 五十年不變

我當慈濟委員後，就開始跟著其他委員看個案，甚至在我女兒出生後兩個多月，就被我帶著一起去訪視了。以前交通沒那麼方便，遠地的照顧戶沒辦法到精舍領發放的物資，或者是外地發生急難事件後的救災，比如火災或者是天災後的勘災跟訪視，我們都是要親身走到現場。往南走，像瑞穗、玉里，甚至跨縣市到臺東；往北，有宜蘭的蘇澳、五結……因為那些地方的慈濟人不

多，所以我們都會過去幫忙。

慈濟的慈善就是這樣一步一腳印走出來的。所以即便是過了幾十年後的今天，在壽豐或光復都還是有讓我記憶很深的照顧戶。

有一個癱瘓的老奶奶住在壽豐，她眼睛看不到，大、小號都是直接在屋裡的地板，所以蟑螂、蛆等小蟲子爬得到處都是。我們找了一群志工去幫他清理，每一個人進到屋子後都在大叫：「我踩到蟲了。」我們把雜物、垃圾搬開，拿水沖下去，大家又是一陣驚嚇。那個畫面真的很難用講的就能形容清楚，只有在現場的人才能感受到那可憐的樣子。

還有在光復鄉下有一個中風的個案，他也是行動不方便、長期臥床，大、小號都是在床邊的桶子，平時靠親戚或鄰居送東西來給他吃。我們初訪的時候，看到的就是髒亂！他的墊被、蓋被上都是油垢，床旁邊有一張小矮桌，上面放了一個大碗公，親友送餐來就直接往裡面倒，他再側著身體吃，吃完後碗公就放著；我看到的時候，就像從來沒洗過一樣，連我們家養的狗吃東西的碗都沒有那麼髒。

接光復這個個案時，我女兒大概五、六歲了，她也有跟我去。她在裝滿排泄物的桶子旁邊走來走去，我們趕緊走過去要把她帶走，還跟她說：「不要摸，這麼髒！」可是她竟然都不怕，在旁邊幫一些小忙。

案主全身衣服和棉被都沾滿油垢，墊被硬梆梆的，一看就知道是很久沒有清洗。我們雖然只是初訪，但因為心裡真的很不捨，當下就決定要為他清理。我們幾個人就去找魏伊屏師姊，她是我們在光復的委員，家裡開百貨店；我們挑了一床棉被、一些

衣服，再回來幫案主清洗乾淨，換上一身乾淨的衣服。最後把那桶排洩物抬到水溝去倒掉，倒下去時的味道，在場的志工都忍不住吐了起來，現在想起來都還是會想吐。

他的生活真的比一般人家裡養的寵物還不如，也讓我感覺到，人生真的很苦，尤其是病苦，又沒有家人可以陪伴照顧，人生才會變這麼不堪。好在我們的社會已經進步，現在的社會福利已經足夠來照顧真正需要的人，像這樣的個案情形，就可以得到政府的安置，或者是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可以運用。

現在，我們慈濟的人多了，訪視關懷的做法也有改變，接案後有初訪評估、個案研討，再決定怎麼幫忙跟補助，有一套流程。我們的服務也比以前廣泛，像現在訪視團隊有時會邀約大家去幫照顧戶清潔家裡的環境或修繕。不管怎麼變，背後那分拔苦予樂的精神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有變，上人五十多年來，一直用同樣的初衷在帶領我們。

## 七、把握因緣 女人當男人用

以前去訪視個案後，每個月都要進精舍開慈濟聯誼會<sup>37</sup>，聯

37 慈濟委員聯誼會，固定在農曆每月 24 日發放日之前的星期日舉行。早年開會的地點在精舍大殿，當時精舍建築非常簡單，以大殿為中心，後面是辦公室兼察房、左側是廚房兼餐廳，廚房旁邊還有個小小的工作間；整體建築就只有這樣。當天用完午齋後，大殿內架起六、七排木架子，上面擺放著木板，再鋪條塑膠布就是會議桌了。聯誼會沒有司儀，也沒有議程，就在上人手持引磬、帶領大眾禮佛三拜後展開。而所謂「大眾」，也僅是幾位常住師父，和來自各地準備報告當地會務的師兄師姊幾

誼會是在星期天，由上人親自主持，主要是個案的報告研討。

一開始參加的人以花蓮委員為主，頂多還有臺東回來的委員，中午用餐就是我們花蓮各組委員輪流煮飯，輪到我們第四組的時候，都是提前一天想好要煮什麼，再由照子師姊<sup>38</sup>、林碧芭跟我把菜買好；剛開始做的時候，總是抓不準數量，就找掌廚經驗豐富的靜雯師姊<sup>39</sup>，問她一斤菜可以炒幾盤，過程真的是很有趣。

用餐過後要開會，我們就把大殿玻璃窗外的防颱板拆下來，精舍的生活克難，空間及所有的設備都是多功能的；木板拆下來後，放在幾張童軍椅上面，就變成臨時的桌子，一群人圍坐就可以開會了。

講到克難，我就想起建醫院的過程<sup>40</sup>。第一次動土（1983 年 2

十人而已。依慣例，上人會先開示；之後師兄師姊報告會務及訪貧或複查情形，並將個案提出討論——在會中決議需要送醫或助學；或依其人口數、實際需求等，酌予濟助現款或白米。務求將分釐善款發揮最大功用。資料來源：靜淇，〈四十年殷殷不變的叮嚀——我憶聯誼會〉，《慈濟月刊》473 期（2006 年 4 月），頁 83。

38 林照子，委員號 831，法號慈妝。

39 靜雯為 25 號委員許彩雲的法號。

40 五十年前，上人因不捨花東「貧」之苦而展開慈善救濟；在慈善救助中發現貧與病如孿生兒，感於花東地區缺乏能救治重大傷病的醫療院所，遂決定建院。「無論慈善或醫療志業，都是起於一念不忍之心。」今日為花蓮慈濟醫院啓業三十周年，上人談到花蓮慈院第一次動土的國福里土地，是在當時的總統蔣經國先生、內政部長林洋港先生、花蓮縣長吳水雲先生的大力協助下促成。動土典禮前，因連日細雨、土地泥濘，師兄師姊載來粗糠鋪在地上，讓參加者的衣鞋不沾污泥。動土典禮，諸山長老、政府首長同來祝福，當時雨已停，東方天際透出陽光，映照地面粗糠如黃金鋪地。沒想到動土之後，配合國防計畫，慈濟醫院不得不易地興建。幾經辛苦折騰，找到花蓮慈院現址，在李登輝先生協助下，以軍

月5日)，是在國福大橋那裡，我們這群女委員先去幫忙整地、除草，這些工作對我來講一點都不困難，因為我從小就到山上做工慣了；動土典禮前因為下過雨，我們把粗糠鋪在地上，真的像黃金鋪滿地，那時候做到很歡喜。1984年（4月24日）第二次動土的地點，就是現在中央路上的慈濟醫院，因為那裡原來是農校的實習農場，裡面有一個魚池須填土，我們還下去池塘捉魚放生。那個年代，現代的人應該很難想像，真正我們是女人都當男人用，我感覺只有在慈濟世界看得到。

醫院還在營建的階段，北區師姊們開始帶會員坐火車回來參觀，那時候北迴鐵路已經通車，這就是慈濟列車的開始<sup>41</sup>。他們抵達花蓮都是訂豐濱遊覽公司的車，當時我先生是公司的總經理，他很支持我做慈濟，因為車輛調度要搭配列車的空間，有時還會有夜車，所以我先生都是親自調度，司機對他會比較順從，也就不會刁難。

醫院啓業後，接著就是靜思堂的動工<sup>42</sup>，後來聯誼會開始改

到醫院大廳舉行，慢慢轉型為會員的聯誼會，上人會出來對各地回來的會員開示，那時就不再做個案研討了<sup>43</sup>。靜思堂的地上建築起來之後，都還是粗胚，寬闊的大硬體，內部還沒有裝修時，像現在的書軒、感恩堂，那時候地上都還沒磨平，因為搭乘慈濟列車的會員很多，才讓參觀動線開始進到靜思堂，勉強用塑膠椅排一排，讓大家都坐。

雖然一切都很克難，但我們仍然精進修習佛法。以前精舍打佛七的時候，我因為要上班，沒辦法全程參加，所以會在星期六、日幫忙行堂，就是去配合林碧玉、林素雲、靜淇，服務很多外區回來的師姊。林碧玉會做整個規畫、安排人力工作，第一組負責煮飯的話，我們行堂就趕快先把餐具排整齊、要送餐，等要過堂的時候，我們就要去送供，非常莊嚴；那個時候人少，上人都是親自在過堂當中，教大家食的威儀。

還有每年的過年，我都會回去精舍誦《法華經》，從初一開

行灑淨儀式及動土典禮。（紀念堂後更名為靜思堂）資料來源：〈慈濟醫院正式啓業〉，《慈濟月刊》238期（1986年8月），頁8。

- 43 民國61年（1972），由於慈濟會務自花蓮向南、北部拓展，為加強委員間聯誼、交換工作心得，以促使會務更順利推展，上人即訂定每月召開委員聯誼會。因為委員人數不多，便在精舍大殿擺上桌椅，就地舉行。十三年後，隨著慈院、護專積極進行籌設，會務發展快速、委員大增，以致大殿不敷使用，故於民國74年，另闢精舍中庭作為會場。民國78年，精舍容量又達飽和，便移至慈院一樓大廳。短短一年內，全省慈濟會員激增至六十五萬人、委員近二千人，而每月參加聯誼會者，更動輒三、四千人以上，一百五十坪大的慈院大廳已顯擁塞，遂於今年5月13日，再次轉移至尚正興建中的紀念堂一樓舉行。午膳後，上人開示勸勉大眾「治安如何，事在人為；欲淨化人心，就得提倡孝道，孝道的闡揚，是社會安定的礎石。」資料來源：念慈，〈慈濟之路是菩薩學處溫馨慈母日，慈濟委員聯誼會在紀念堂召開〉，《慈濟月刊》106期，頁3。

方、慈濟、農校三方換地方式取得土地，由時任內政部長的林洋港先生前來動土。資料來源：釋德，〈證嚴上人衲履足跡2016年8月17日不驕、不疑、不貪〉，《慈濟月刊》598期（2016年9月），頁137。

- 41 慈濟列車一詞是因1989年9月17日，慶祝慈濟護專開學典禮及慈院開業三周年，貴賓、委員、會員二萬餘人參加；為紓解人潮，慈濟特向臺灣鐵路局提出專案申請，加開火車班次，由於整列火車僅搭乘慈濟人，因此又被稱之「慈濟列車」。但早在1972年8月24日，臺北第一位委員靜銘師姊就招募了四十多位同道，搭乘遊覽車前往花蓮，參加靜思精舍每月一次的「救濟金發放」，了解慈濟如何照顧貧戶；撤除交通工具的差異，可算是由臺北發出的第一班慈濟列車。資料來源：慈濟年譜資料庫。
- 42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啓業典禮，於8月17日上午十時，在醫院廣場右側隆重舉行。慈濟醫院在啓業典禮之前，於上午八時為即將動工的紀念堂舉



始到初九，每天早上去誦、去拜經，結束時開車從精舍回家的路上都快要打瞌睡了，可是又覺得真的好殊勝，能夠感受每一品經文裡面的那些情境。禮拜〈法華經序〉是一字一拜的，那梵唄聽起來就很攝受。每個月初一、十五也是回去精舍拜經，初一要誦《無量義經》三品，十五也是《無量義經》三品，每次都連著三天；那時候也不曉得哪裡來的精神，三點、四點就起床，開車回精舍做早課。

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還是一個上班族，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很多重角色在身上，但我就是要把握因緣，可以做就爭取來做。從以前到現在，一本初衷，這種精神沒有變，我上班認真，家庭主婦還是要做，孩子的媽媽也是要當，什麼角色都是一樣要做好。退休以後，我更沒有辦法不做慈濟，比上班更忙，大家都說我是太過動。

只是現在有年紀，體力真的沒辦法像以前那樣回精舍精進，



1983年2月5日鄧淑卿(左一)參與花蓮慈濟醫院第一次動土興工，地點在國福里的建地。

幸好現在有視訊連線，自從在環保站開始有志工早會連線時，我就沒有回精舍，直接在環保站聽上人開示。最近因為疫情(COVID-19)的關係，上人讓大家在家裡就可以連線，就更方便了，我都很珍惜，有連線就要聽。



1983年6月7日慈濟志工簡美月(右起)、鄧淑卿、李惠瑩、黃麗蓉於三十米大道(中央路舊稱)上散步，身後為花蓮慈濟醫院用地。



1984年4月24日花蓮慈濟醫院第二次動土興工，地點在醫院現址。鄧淑卿在前排左蹲在土堆上。

## 八、近師情怯默默付出

早期的花蓮委員都是跟在上人身邊一起做事，雖然距離很近，但互動就是比較保守。或許跟人稱花蓮是後山，資訊沒有西部、北部那麼發達，民風比較純樸有關，所以大家也比較不懂得怎麼去表達內心的感受。

我女兒還小的時候，只要是我要進精舍做事，像幫上人打針或是開聯誼會，我都會帶她一起回去，有時候兩個兒子也會一起去，小男生會在精舍亂跑。以現在的主堂位置來看，一進去的左邊，以前應該就是上人的書房，前段是會客用的小小空間，只有一張茶几、一張沙發。

女兒慢慢長大，兩、三歲會走路時，她就會自己開紗門走進書房；上人聽到開門聲音，沒有看到人進來，就會低下頭看看，我女兒就會自己去跟上人頂禮，我隨後也會跟著頂禮，這些都是印象很深的事情。

因為常常去打針的因緣，慢慢就看到臺北的師姊越來越多。每一次外縣市的師姊來，尤其臺北師姊，她們進了小會客室，向上人請安、請法；上人坐中間，我就在旁邊，打針差不多要四、五十分鐘，這樣的因緣我就會看到外縣市來的師姊們跟上人的互動。

可是我比較少看到花蓮的師姊爲了請法進精舍，我感覺她們比較不知道要提出問題來問，不像臺北的師姊她們可以很自然、很親近地跟上人互動，無話不談。其實，花蓮師姊們到現在都還很害羞，每一次有活動或座談，花蓮法親跟上人分享、報告，都很膽怯和保守；我們就是默默做，彼此也像是一家人，只是不夠

活潑。

就像以前我們花蓮區的老大姊靜慈，她是最早期的委員，就是這樣一直做，也沒有想到平常可以帶著大家去跟上人請安。花蓮的我們比較像媳婦的感覺，比較害羞，跟上人很近，好像常常、每天都見得到，可是感覺上又有一點距離。我自己也是這樣，雖然爲上人打針，和上人最是親近，但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怎麼跟上人請法、請益，好像心裡總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不敢開口。

不過，我還是很感恩自己有福報，有因緣能親近上人，那時候我親眼看到上人身體比較虛弱，他都是一直靠著意志力走過來，到這幾年，體力又差很多了！全球的慈濟志業重擔都在他身上，他心中也總是牽掛全球的貧苦災難，所以我們雖然不是很有能力，但一定要盡全力，人人的點滴匯聚就是力量。



1983年12月，花蓮資深委員與證嚴上人於靜思精舍大殿前合影。右起爲林碧玉、鄧淑卿、余秀琴、證嚴上人、吳玉鳳、簡美月、蔡秀梅；前排小女孩爲鄧淑卿的女兒陳潔瑩。

## 九、兒子墜樓 善緣共扶持

做醫療、慈善訪視這麼多年，再怎麼難以想像的意外事故傷患、貧病個案也都見過，卻不曾想過有一天無常會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發生。

1991年，我老二（彥樺）當兵退伍的前一個禮拜，他休假到臺北去，打算那天晚上要到我先生的公司宿舍過夜。到了半夜，住臺北的小姑打電話到家裡來，她慌張地跟我說：「彥樺從三樓摔下來，現在在臺大（醫院）急診室……」她說她會先處理，要我天亮以後再趕過去。

當我知道兒子整個臉部、頭部，都有撞到，脊椎也有彎曲，我就跟小姑說：「妳看他的情況如何？醫生若說情況真的太嚴重，沒辦法救，可能變植物人，妳就幫他做器捐。」我當下真的就是跟我小姑那樣講，講完以後才跟先生說我已經做了決定，我只是很私心地覺得，萬一是植物人的話，就讓孩子有機會捐贈器官，去擴他的大愛，延續別人的生命。我隔天到了醫院也是跟醫生說，他要是救得起來就救，要是救不起來就不要勉強。

但好好的一個人去臺北，怎麼會從三樓掉下來？我後來才知道，彥樺到宿舍的時候，在裡面睡覺的司機先生把門鎖住了，人叫不醒，門也打不開。他就爬上屋子的外牆，想要從窗戶進去，結果一不小心就從三樓掉下去！幸運的是，一樓停了幾部計程車，他摔在計程車上。

當時我想到了曾經到花蓮慈濟醫院支援看診的臺大神經外科醫師蔡瑞章，他1987年就進到慈濟醫院，我們算熟悉，所以半夜就直接打電話給他，說我兒子從三樓摔下來，狀況非常嚴重、

非常危急，請他幫忙關懷一下。蔡醫師真的半夜就到急診室去看我兒子！

我和先生搭夜車趕過去，看到病床上的兒子摔得不成人形，心裡好難過，我們整整一個星期都在那邊照顧他。我真的很感動，也很感恩蔡醫師，接到電話後就到急診室看我兒子的狀況，第二天就幫我們安排住院，讓我兒子順利在那邊做治療，而且他天天都早晚親自來關心、關照我們，我真的很感動。

在那個年代，臺大神經外科病房一般只收住腦瘤病患較多，腦部外傷的都不會收住院。因為那邊都沒有這樣的病人，他們的護理人員，包括護理長，都用異樣的眼光在看我們，他們都很好奇這是何許人物？為什麼會讓醫院破例收治？而且蔡瑞章主治醫師還會親自來換藥、關懷。

讓我一直感念在心的還有上人跟精舍的師父們，我的孩子從小就常跟我進精舍，可以說是師父看著他們長大的。所以一聽說我兒子重傷，師父們誦了一個星期的《普門品》來為他祝福。

兩個星期後，兒子從臺北轉回來花蓮，坐飛機的過程也是很順利。其實腦部挫傷之後，他常整個晚上都沒辦法睡覺，躁動、意識不清楚，他會叫喊，我就要用輪椅推著他在院內走廊繞一整夜。後來，回到花蓮住進我們慈濟醫院，他就漸漸穩定下來，在耐心照料下慢慢復原了。

治療期間得到的有形與無形的幫助，真的好多好多，很感恩我在慈濟跟大家結了這麼好的緣，也很感恩，兒子到現在都沒有什麼後遺症。我真的是非常地感恩慈濟給我們很大的幫助，而且有很好的貴人相助，幫助我們很多。

## 十、知福惜緣感恩報恩

回想這一段過去，我雖然沒有很專業的教育養成背景，但我有書本中沒有的實務經驗，還有要讓個案更好的單純心念，所以能在專業的趨勢中，學習怎麼與社工磨合，進而討論出怎麼給案家更好的改善及影響。

一直到現在，我都很珍惜在慈濟的緣，雖然與委員互動或者是在工作上，難免有意見不同，或者是角度、角色的不同，帶來一些人、事、物的煩惱，其實我這個人是比較粗線條，事情不會放在心上，很快就過去了，否則要怎麼在一個團體維持這麼長久的時間。

對人生的無常，我也能很快調整自己。像我家師兄（指先生）2015年生病，我在同年的8月底要接受頸椎開刀，但還是要用輪椅推著他去看醫師。我開完刀後，他10月檢查確認肺癌，隔年的10月，才一年，他就往生了。在這個期間，我雖然是盡心盡力在照顧，但就是陪伴而已，也沒辦法代替他受苦。其實我因為在醫院工作的關係，很了解癌症化療的過程是痛苦不堪，先生能一年就解脫，也是安慰。

生命的循環總是這樣，我為什麼要把這些事情放在自己心裡頭、走不出來？我看過很多人遇到老伴走了，會把自己的心關閉很久；我也知道不捨是絕對的，到現在我當然還是會想、會懷念，回到家孤伶伶一個人，還不是一樣會見物思情。但是我們一定要自己去轉心境，要維持自己的平靜，好好利用時間，把身體照顧好。

在那個過程中，就是學習要怎麼調適自己，這個心思是要靠

自己，若沒去調適，就是苦了自己。所以師兄往生後一個星期，我一樣照常出去做慈濟，上人教了那麼多的（佛）法，我如果不拿來用，躲在家裡把時間浪費掉，那就很可惜了。

現代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得憂鬱症？我覺得是煩惱太多，煩惱這個孩子怎麼樣、那個孩子怎麼樣。我都覺得放自在一點，子女有子女的家庭，有子女的上班時間，我們只要把自己的身體照顧好，就不會讓子女有負擔；讓他們專心為事業、家庭努力，大家都平安，我們自然就不用罣礙。

我今年（2021）七十七歲，快八十了。走到現在，覺得自己真的不能沒有慈濟。以前不會想太多，只是覺得既然參與這個團體，我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我就把握機會，趕快去做，時間是我的，掌握在自己，所以就可以越來越自在。

現在一個人，比較有時間想，我覺得理念要正確，真的就是靠自己懂得把握，要疼惜法親、要珍惜可以做的因緣，珍惜上人教我們的佛法。上人帶大家做慈濟，從無到有，我們只要相信，堅定地信，就可以讓自己非常篤定地在慈濟的路上，不會偏離。我就是很堅定我要修行，我希望自己做到最後一口氣，不必經過病苦，在病床、在醫院，而是能夠自然結束這一生，那是多麼自在。

我現在感覺一生真的沒有什麼遺憾，而且是無怨無悔，因我做對我這個生命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做慈濟。真的很感恩，這價值怎麼去評量？很難講，你要怎麼去說生命價值是什麼？我天天都會去花蓮慈院的人文室幫忙，都會跟年輕人說：「每一個人年輕到老，不同的年齡，思維都不一樣，我真的提醒你們，趁年輕要會把握，要知道做對事情，對這個社會，有付

出。」我也不敢說什麼奉獻，至少說我們的生命，是有價值的，能夠去服務人，這就是我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2009年9月19日花蓮慈濟醫院「國際失智症日」活動，六十五歲的鄧淑卿（右）仍然活力十足，帶動社區長者一起活動筋骨。



慈濟50週年時（2016年），花蓮資深慈濟志工齊聚參與節目錄影，帶著大家一同走入時光隧道，回顧初發心與做慈濟的歷程。（左起）林照子（慈妝）、吳月桂（靜璿）、羅雅馨（慈旋）、鄧淑卿（靜善）、林碧嬌（靜淵）、林慧美（靜盈）、陳秀鳳、蔡秀梅（靜瑩）。